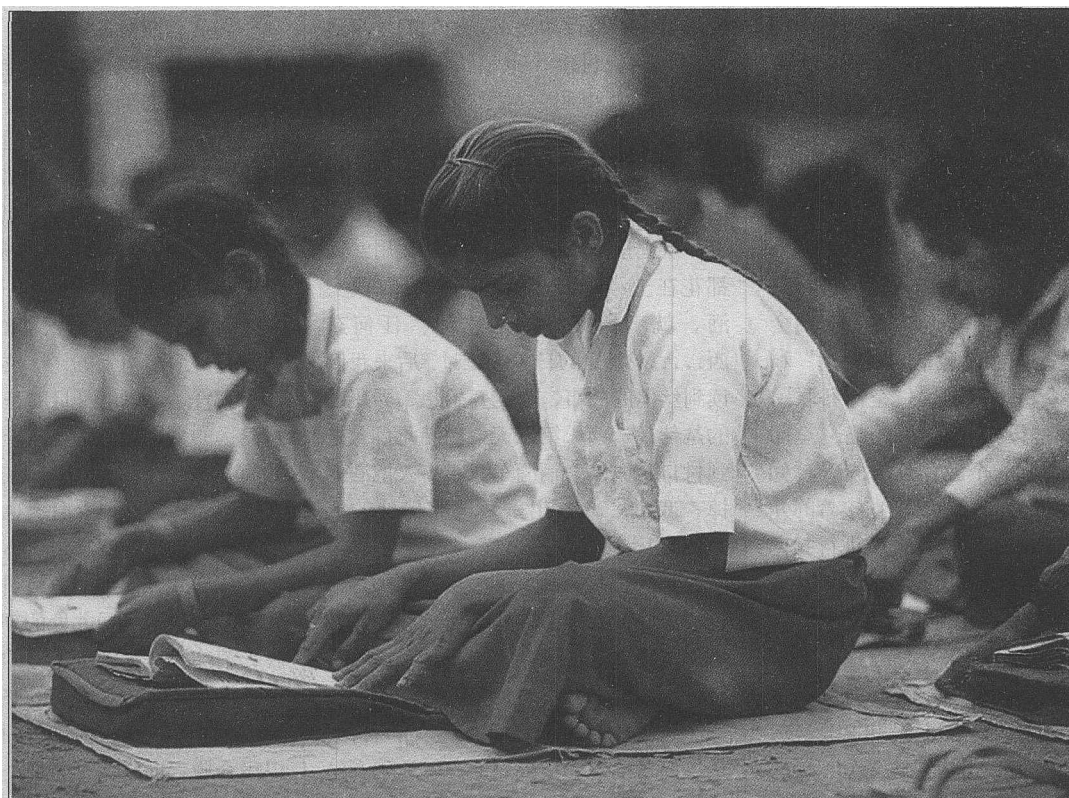


乡村建设



印度的扫盲运动

□ 刘健芝

什么是现代国家的国民？我们会想到国家赋予他们公民权利，他们对国家承担公民义务，也就是说，现代国民应有能力掌握现代知识与技能，所以，识字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一个指针。可是，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，奋力扫盲却依然徒劳，国民的“落后”被看成为既是国家落后的结果，也是国家落后的原因。

在印度，情况最恶劣的比哈尔邦，识字率是47.53%(2001)；印度全国平均水平是65.38%；但西南的喀拉拉邦，却在十多年前——1991年4月——便已经成为全民识字邦。这个不平凡的数字背后，有一个不平凡的扫盲故事。

1962年，一批科学家走在一起，要普及科学知识，让民众能掌握对他们有

用的技能。首先，他们把英语科普读物翻译成喀邦语言马拉雅拉姆语。“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”（简称“喀科运”）就这样诞生了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1978年，在全国990个乡之中的600个乡，逐步成立了“农村科学论坛”，目的是与村民一起尝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。“喀科运”的构想，是每个村庄有两名“喀科运”的活跃成员，对当地问题有具体细致的了解，带动村民建设社区。

经过几年实践，“喀科运”发现，几名活跃成员可以起带头作用，但社区整体发展必须靠民众积极参与，尤其是最底层的人、最边缘的人不能被遗弃。1986年，“喀科运”调整策略，将重点放在推动全民识字，让识字的人不只学懂

看书读报，还培养能力掌握知识，创造知识，以改造他们生存的环境。“喀科运”决议在五年内令喀邦全民识字，于是筹划一个行动纲领，送交印度国家教育部。试点建议在17万人口的安那库林区（Ernakulam）进行。国家扫盲委员会在1988年审批拨款。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，因为“喀科运”从未肩负这么大的项目，国家扫盲委员会也从未将这类工作交给一个民间志愿团体来推行。

“喀科运”的计划，是在该区动员1.5万名志愿者进行为期一年的扫盲活动。这种庞大的动员史无前例。上街示威、罢工抗议之类的行动是印度公民常见到的，但大量义工动员做社会公益事业，则出乎政治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意料。1989年试点工作开始进行，同时，

乡村建设

“喀科运”组织文艺演出队，巡回至全邦1600多个地点作宣传，印制、售卖大量小册子，宣扬与扫盲、发展、自治相关的理念。

1990年2月，安那库林区宣布成为全印度第一个全民识字区，参与的义工有2.3万名。试验非常成功，旋即在全邦开展，动员30万志愿者；1991年4月，喀邦成为全民识字邦。国家扫盲委员会非常赞赏这个成绩，邀请“喀科运”和“全印度民众科学联网”（“全印科联”）协助在全国推行扫盲运动。为此，“全印科联”专门成立一个教育机构，名为“知识与智能促进会”（BGVS），在接着的几年，在全国多个邦约400个区推行扫盲运动，报名参加扫盲运动的学员有1.2亿人，报名的义工有1000万人，实际完成比例甚高。

数字固然可观，但扫盲运动的真义不在量，而在质。“喀科运”的出发点，并不把文盲的村民看成愚昧无知、缺乏教养。相反，他们相信民众之间流传宝贵的民间智能，人人有学习能力、应变能力。现代社会的大小事务总离不开文字，民众识字，能更有自信参与，能更好地谱写自己的历史。

内洛尔区的扫盲运动在1990年1月宣布开展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宣传推广——主办者组织歌舞创作、街头剧团、家访等等，到各村各户动员教员和学员志愿参与。1991年1月，扫盲班正式上课。在杜巴贡德村（Dubagunta），学员有三本教材，其中一本有一个《丝姐的故事》，说的是丝姐的丈夫酗酒，她无法改变丈夫的恶习，自杀了。杜巴贡德村的扫盲班妇女学员，读到这个故事时百感交集，纷纷诉说她们自己的故事。59岁的玉婷（Uddin）说，她的丈夫14年前被酒精夺命，死前经常酒醉闹事。在这个贫穷的农村，自然环境恶劣，农作物经常被台风摧毁，失业普遍，更糟糕的是，仅有的一点钱，常被男人拿去喝得酩酊大醉，回家后虐待妻儿。

扫盲班的妇女，诉说各自的不幸，有的说，丈夫打她有了新的理由，就是她这么大岁数，还要甚么脱盲识字，是疯了。妇女们商议后，决意村内不留一

个酒鬼，于是行动起来。她们的故事迅速传到其他村落，也很快写入扫盲读本，新的故事叫《如果妇女们团结起来》。这一课说：“这不是虚构的故事，这是我们上扫盲夜课的妇女的成就。我们的村叫杜巴贡德村。我们用血汗赚取工资，从土里生产金子，但有什么用？钱都花在土酒上，我们的男人没有钱买酒，就卖掉家里的米、油、任何东西……我们的日子很难过。后来我们读到丝姐的故事，我们开始想，弄死她的是什么……第二天，我们几百人走到村口，截停一辆酒车，叫商人把酒倒掉，我们一人拿出一卢比赔偿他的损失。他吓怕了。就是这样，那天以后，再没有滴酒进村……我们现在有力量，也有信心。我们知道只有通过教育，我们才能取得这次胜利。”

在之后的村民自治选举中，玉婷被选上村委主任，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，是不简单的。如星火燎原，各地妇女纷纷起来反对土酒。在1992年的民间反酒运动压力下，邦政府在1993年宣布全面禁酒。在里贡达伯度村（Leguntapadu），一名政府官员应邀参加反酒集会时，问妇女能否一天储蓄一卢比。一名妇女上前，把一卢比放入他手里，其他妇女纷纷效法。官员问，为什么把钱给我，为什么你们不组成小组，把储蓄集起来，自己管理？储蓄运动从这个村开始发展，超过20万名妇女自发组织了妇女储蓄小组，接着逐渐有能力以集体名义向银行或信用社贷款。

印度有许多世界银行、联合国、政府、非政府组织等搞的小额贷款项目，但前述例子主要不同之处，是这些自发的妇女小组，是经过扫盲运动一段时期的个人能力和集体意识的培育之后，从妇女自身面对的日常问题出发，寻求解决。掌握知识、增加自信、维护尊严，是内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。

反土酒运动和妇女储蓄小组运动，是由扫盲运动引发的。喀拉拉邦带头开展的扫盲运动，最可贵的是它是一场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。让全民成为有知有识之士，这个目标是全社会接受的；运动实际开展之时，也卷入社会各阶层，尤其是政府官员、不同党派人士和科技专才，充当义务教员，在与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学员共处的期间，打破隔膜，消除误解，增进相互的认识。扫盲运动推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整合和社区发展动力的开发。也因此，扫盲运动并不以民众脱盲而结束，而是全社区成员进一步卷入对社区本地资源的了解、探测、开发。乡村建设运动不仅有了本地骨干人才带头，有了广大民众参与，也有了凝聚建设运动的公理人心和人际网络。扫盲运动奠下基石，让民间自发的社区规划行动可以开展，也让1996年史无前例的喀拉拉邦“人民计划运动”得以推行。

这里的“发展”，综合了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。它首先是一场文化运动，一场人的提升的运动。■

责编 / 邱建生

